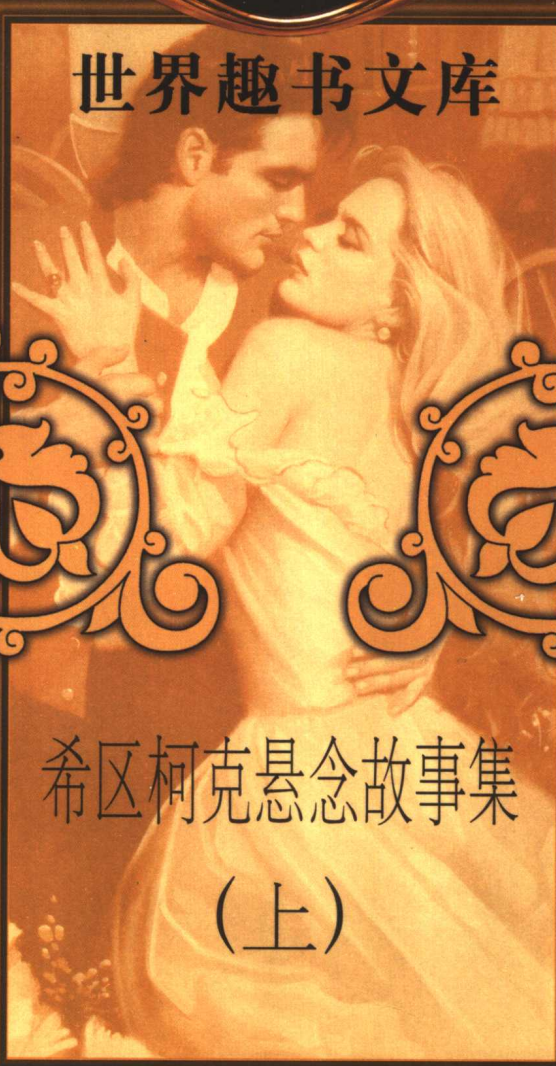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趣书文库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上)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上)

王 强 编
张 章 译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下)

王 强 编
张 章 译

迪灵顿街的回忆

“妈妈，我真希望能够认识外婆。”十岁的女儿对我说，她那双碧绿的眼睛晶莹剔透，“我要像外婆一样，成为一位舞蹈家。”

“我也是！”两个小女儿异口同声地说。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我的三个女儿都有一头鲜艳的红头发和奶油色的皮肤，这些都遗传自她们美丽的外婆，我自己也是金黄色的头发。

丈夫坐在扶手椅里，面带笑容看着我们。他很高兴看见一位美丽的家庭主妇，被三个可爱的女儿围绕着话家常的生动画面。

我常怀疑，如果他知道我早年在迪灵顿街所过的生活，不知会有何反应？当然他是不知道。

为了回答孩子们对我过去生活的询问，我编织了一段黄金般美丽的童年生活，事实上我告诉她们的故事中，只有一样是真实的：我美丽的红发母亲，在我十二岁时逝世。

我从未见过父亲。母亲曾经告诉我，父亲是个船员，在海里失踪。可当母亲过世后整理她的遗物时，我没找到结婚证书，甚至也没找到一份能证明我身世的文件。

我对早年生活没有记忆，所以我的记述日期就从那年冬天搬到迪灵顿街开始，那年我四岁，母亲二十一岁。

我记得迪灵顿街是条相当长的街，两旁是凄凉阴沉的住宅，屋前有高高的台阶，每家的大门都被漆成绿色。

我们这条街的大多数家庭都是接受政府救济过日子的。母亲和我住在二楼一个单间里。

我们在同一间屋里烧饭、吃饭和睡觉。像所有的住户一样，我们的房间在冬天又冷又通风，到了夏天就闷热不透气。

街上倒是热闹非凡。各种车辆来来往往，小贩沿街的叫卖声、孩子们的吵嚷声不绝于耳。



邻居孩子第一次邀我玩的游戏，是要我在整条街找出哪一家门漆成红色。在小朋友的鼓励下，我挨家挨户地爬台阶下台阶，一直到我因为两腿疼痛而哭起来。

“大笨蛋！”八岁的吉姆说。他后来告诉我，我们家住的那幢房子的门柄下就有红油漆，只不过原先的油漆有些剥落了。

母亲被我沮丧的哭声引了出来。

“请好好和我的劳拉玩儿。”她央求着小朋友们，他们则敬畏地看着她。母亲很会打扮自己。夜里，她的红头发一卷卷地卷起来，白天再放下来，用头刷刷一刷，头发就自然地垂在肩上。

她常常把睫毛刷黑，衬托她那迷人的碧眼，使眼睛看来更大，嘴唇颜色更鲜艳。

她很宠爱我，管我叫洋娃娃，老叫我穿小女孩的衣服，那种衣服我早就不该穿了。

有一阵子，母亲外出找工作，我被交给邻居尼古拉斯太太照顾。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寡妇，身体不太好，住在我们楼下，是整条迪灵顿街惟一对我母亲友善的人。

那时是经济恐慌末期，找一份工作非常困难。好多个夜里，我们母女饿着肚子上床，可母亲经常回家说她已经找到工作，而后母女俩便大吃一顿。

悲惨的是，母亲的工作从没有维持多久，麻烦总是紧跟着母亲：店员的恶语中伤；顾客不怀好意的调戏；老板妻子的多疑。终于，她不得不放弃寻找工作的念头。

不久，家里开始有接连不断的男人光顾，母亲告诉我她在教授舞蹈，我相信她，因为母亲很爱跳舞。

然而过了不久，我就不信了，因为那是假的。

每当母亲有一位顾客夜里来访，我就得躲在楼梯间等候客人离开。

我不了解母亲，不仅是因为无知，而是我太不懂世上的事情。

我八岁时，有一天晚上，十二岁的吉姆嘲弄地对我说：“笨蛋，你以为你妈在楼上和客人做什么？”

他开始扯我的衣裳，我高声叫：“滚开！别惹我！”

尼古拉斯太太打开门，张望着阴暗的过道说：“劳拉，是你吗？”

吉姆边下楼边说：“你在问谁？”

“回家去，吉姆，”尼古拉斯太太说，“你再招惹劳拉，我就叫警察。”

“去呀！”吉姆不屑地说，出门时又朝尼古拉斯太太吐口水。

这一带有个不成文的法规，除非有人命案，否则不喊警察。

我长到十一岁时，渐渐地明白了一些事。

我一直以母亲的美丽和她的衣著打扮为荣。她经常穿些时髦、带滚边的衣服，而不是街坊妇女们穿的退色的、破旧的家常服。但是我现在却开始希望她和别人一样。

我注意到尼古拉斯太太的女儿，她常常来看母亲，人家穿着朴素，但看来很迷人。

邻居的妇人们也暗地里批评母亲。每当母亲出现时， she 会把邻居的男人们吸引住，但这些男人没有一个上过我们家。

春天到了，有一天放学回家，吉姆和他的那群小流氓挡住我的路，我想躲开，但是吉姆跳着阻止我。

“你母亲是鸡。”他说着，阴险地咧着嘴笑。

我从没听过这种字眼，不知道它的含意。但我懂那是嘲笑，我总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听别人议论母亲，全是说她坏话的。

我挥动拳头打他，但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哭着一瘸一拐地回家，脸被抓破了，膝盖摔疼了，衣服撕裂了。

“劳拉！”母亲抓住我问，“那些男孩子把你怎么啦？”

“没什么，只是打了一架。”我厌恶地扯开母亲的手，我很想知道“鸡”是什么意思，但心里知道最好不要问。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满十一岁的那个星期，天气非常热，热得街坊的男孩子们都懒得玩儿。我们都尽可能的坐在门前台阶阴凉处，等候送冰的车子来，期望能偷块冰解暑。

我们在门前等候时，母亲和邻居一样，在窗口放着要冰块的卡片。



送冰的人背上垫着橡皮，把冰块扛进我们公寓时，我们几个孩子围在他的马车旁。他进去已经好久了，他都被我们忘记了。

忽然，他出现在我们面前，吼着说：“给我滚开！”只这一声，孩子们便像风中的尘土般散开了。

送冰的人很强壮，黝黑的皮肤。他瞧我一眼说：“嘿，小姐儿，你是她的女儿？”他一甩头，示意二楼的窗口，一撮黑色鬓发垂到前额。我点点头。

他又用头示意说：“到这儿来。”我跟他到马车跟前，他抓起一块冰递给我。

忽然，我不想要什么冰块，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不想要，虽然嘴里干渴得不得了，可我还是不想要。

当他吹着口哨离开时，我张开双手，冰被我扔到水沟里。

偶尔，母亲的访客会评论我的长相，每当有人论及我的长相时，我便会立刻被她赶到外面去。

家里经常有人喝酒。有些客人来看母亲的时候，总是带一两瓶酒来，但我从没看见母亲在白天喝过酒，直到有一个客人开始固定常来之后。

那个固定来的客人年纪不小了，有张饱经沧桑的脸。有一次，他突然来了，发现屋里有一位水手，一怒之下，把那水手扔到楼梯下。母亲很生气，然后开始紧张不安地咳嗽。以后每次她知道那个人要来时，就紧张极了，我就被早早地赶到外面。

有一天晚上，我还没来得及出去，那人就悠然地走进来。他仔细打量着我，吹了一声口哨，轻轻说：“唔，我们这儿有个美女。”

“出去，劳拉。”母亲说。

我神经质地笑着说：“我为什么不能留在屋里？”那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觉得胆子大了些，但仍有畏惧之心。

“当然可以。”那人向我挤着眼睛，“我们把她送到外面，你留下来陪我，怎么样，小姐儿？”

“出去！”母亲打了我一巴掌。

我从没被母亲打过。我哭着跑出房间，蜷缩在楼梯上，心里充满

憎恨，被一阵阵我不了解的冲动撕扯着，我发誓永远不原谅她。

一会儿，争吵声从屋里传出来。母亲高声尖叫着，接着是那个男人的诅咒。然后是家具翻倒的声音，有什么东西打碎了玻璃，落到下面街上。

我听见一只瓶子打碎的声音后，接着是身躯沉重落地的声音。

然后，完全寂静了。

我们房间的门慢慢打开，母亲夜游一般走出来，受伤的脸上流着血。

警笛声越来越近。

她肿胀的嘴痛苦地张开，模模糊糊地说：“屋顶……不要告诉警察。”我背对着她，不理她。

她刚爬上三楼的楼梯，楼下的大门就被撬开，两个警察冲进来。他们三步并两步地跑上楼，看过我们的房间后，其中一个尖厉地吹起口哨。

“这人已走完人生旅程了。”另一个神情凝重地说。

他们走出楼梯间，站了一会儿，就脚步沉重地往屋顶跑。几分钟后，他们下了楼，母亲被两个人挟在中间。

“劳拉！”她哭着，声音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她经过我面前时，我抓住楼梯扶手，尽可能把自己缩小。

离开公寓时，她喃喃地对尼古拉斯太太说着什么，尼古拉斯太太回答说：“别担心，我会照顾劳拉的。”

尼古拉斯太太的女儿每星期四给尼古拉斯太太送肉来，我没有胃口吃，但尼古拉斯太太总是哄我喝肉汤，给我做各种好吃的点心，可我吃不下。她尽管患有高血压，两脚肿胀，但对我却照顾得十分周到。

“妈妈，你太累了，”她女儿总是说“我要你和我回家，找医生好好治疗。”但尼古拉斯太太抗议说她不能不管我，她答应了我母亲。

“她没有亲戚吗？”

“没有，一个都没有。”

“那我们必须和官方联络，”她女儿果断地说，“他们会负责的。”



“我答应了劳拉的母亲，怎么能不管她？”尼古拉斯太太痛苦地握住双手。

她女儿叹口气说：“好吧，妈妈，劳拉和我们一起回家。”

尼古拉斯太太的女婿是个律师，他正式出面和官方办理我寄留在他们家的手续。一九四五年冬天，我离开迪灵顿街，那时不知道自己从此不再回去了。

因为一直在迪灵顿街和邻居的孩子瞎混，所以住进克莱夫律师那有草坪、有树篱的可爱的郊区房子时，心中有点儿不安。我是在水泥砌的丛林里长大的，我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和克莱夫的两个女儿住一个房间，尼古拉斯太太自己住一间。医生说她的心脏不好，需要休息和安静。

我常常站在尼古拉斯太太的床边，默默祈祷，祝她平安。她是我惟一的朋友，没有她我该怎么办？

我感觉到克莱夫太太并不真正想收留我，她把母亲的生病都归罪于我，虽然她嘴上从来说，但我心里明白。圣诞节她为两个女儿添新衣服时，也为我添了一件，我对能扔掉那些小衣服，不胜感激。

吃午饭时，尽管克莱夫一家对我很客气，但我总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不属于他们。我坐在丰盛的佳肴前，心中却想念我熟悉的迪灵顿街。

虽然我试着不去想母亲，也不让自己承认思念她，但是我怀念旧居，有一大部分也是思念母亲。我今日的处境，我认为应由母亲负责。

那年我十二岁生日时，克莱夫太太给我烤了一个蛋糕，那是我生以来的第一个生日蛋糕。

克莱夫的女儿要我许愿。我闭上眼，认真地许愿希望母亲早日获得自由，接着把蜡烛吹灭。女孩子们拍着双手，向我保证说我许的愿会实现。

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那天，尼古拉斯太太很难过，因为她在战争开始时为国殉职。几天后，克莱夫太太告诉我，我母亲生病了，要带我到监狱医院看她。当时我不知道，我所以获准去探视，

是因为母亲病危。

监狱医院里什么都是灰色的，墙壁、床铺，还有一张张肃穆的脸。

我母亲的脸色最难看，开始我找不到母亲，她的床被一扇门挡住了。后来我看见母亲时，被她的苍白脸色吓坏了。她皮肤的奶油色消失不见了，眼里也没了昔日的光彩，她那一头耀眼的红发失去了光泽。我吓坏了。

她茫然地看着我，半天才把我认出来。

“劳拉？”她无力地说。

她向我伸出双臂，可是我却退了一步，心里想到的是那天她打我的情形，耳朵里又听见她命令我出去的声音。

忽然，我明白了以前没有领悟到的事情，母亲始终以其惟一懂得的方式在保护我。

“妈妈！”我哭着扑过去，投进母亲的怀中，“我对不起你。”

“没关系，劳拉，别哭，”母亲抚摸着我的脸，“让我看看你，啊，你真漂亮。”她的手放在我的头发上，“尼古拉斯太太好吗？”

“她生病了，妈妈，她始终躺在床上，医生说是心脏病。”

“哦。”母亲叹口气，眼睛闭起来。

我拉着她的手，生怕母亲睡着。“妈妈，我要回家，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要我们母女俩过以前日子，我们母女应该相聚在一起。

母亲把眼睛睁开，视线落在我身后的地方，说：“也许很快。”

女看守走过来说：“时间到了，你该走了。”

母亲把我紧紧搂住，耳语说：“劳拉，做个好女孩，好好长大。”

在病房门口，我转过身挥挥手，我看到可怜的母亲正在努力想要坐起来。

我们母女被分在两边，我在阳光下，站在生命的门槛上；但我二十九岁的母亲，站在阴暗无光的那边，夜幕正向她逐渐遮过去。

我很想跑回去，告诉她我爱她，我一直爱她，会永远爱她，但是看守不让，叫克莱夫太太赶快把我拉走。



我没有机会对母亲说我是多么爱她。三天之后，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只有在记忆中回到迪灵顿街。我每次回忆当时的情形心里就是一阵酸楚：我蜷缩在楼梯上，警察从我们房间里出来，正在商量往哪个方向追捕凶手时，指示他们上屋顶的是我。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名片之谜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这天早上天气异常冷。

我站在金门公园一处小小的、杂草丛生的斜坡上，双手插进外套口袋，眺望罗尹德湖平静的、浅浅的湖水。

寒冷的白色太阳正从晨雾中穿出来，阳光在湖面上舞动着，使湖水的暗灰色变成半透明的蓝色。

这一片景色非常平和安详，有着田园般的宁静。这时候的旧金山市还真是个美丽的都市。

警笛声从远处传来，我向肯尼迪车道和远处的草坪望过去。

一辆救护车进入我的视线，停在湖前的车道上。从车上下来了两个人，从救护车里取出一副担架，走上小路。

一位穿制服的警察过来迎接他们，我注意到他们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两人开始爬上我站立的那个柔软如海绵的斜坡。

我看着他们走到一棵高大的柏树下，用一条被单盖在布伦达的尸体上。我很高兴他们把她遮盖起来，因为这样寒冷的早晨，没有遮盖地躺在那儿似乎不合适，即使已经身亡。

两个从救护车下来的人开始向下面的人群走去。当他们走近时，人群中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站在我身旁，朝湖面望去。

我们都静静地站着。和我站在一起的男人名叫维克多，他是旧金山市警察局的警官。

他从口袋里取出烟斗，往里塞了点儿烟草，衔在嘴里，但没有点火。

“怎么样？”他说，可眼睛没有看我。

“对不起。”我说。

“你不认识她？”

“不认识。”



“她的皮包里有你的名片，”维克多说，“你是不是在替她做什么事？”

“我有许多客户。”

“那么，你也许和她谈过话。”

“维克多，我不认识她，”我说，“我早说过了。”

“为什么她会有你的名片？”

“她也许打算抽时间来看我。”

“可是从没去过？”

“没有。”

“你分送出去很多名片？”

“不太多。”

“她为什么会有呢？”

“我不知道。”

我们默默地看着湖水，不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要是我知道什么的话，我会告诉你。我可以走了吗？”

“你要回办公室？也许回头我会去你那儿。”

“假如你愿意的话，非常欢迎。”

维克多转过身回到那群人当中。他们刚刚把布伦达的尸体抬上担架，我能看见一只细细白白的手在被单下面垂落着。她今年二十三岁，有人残酷地杀害了她。

我慢慢走下斜坡，沿湖边小路走到车道上。我在汽车里坐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很冷。

我的办公室有股尘埃和香烟的气味。我把窗子打开，让楼下的噪音传进来，然后在办公桌前坐下来。

我看着窗外，身上仍觉得有点冷。

坐在那儿，心中想到岁月能催人老。世上的事不再会令你吃惊，哪怕是死亡。你开始用一种超然的态度看世事。你内心麻木不仁，不像年轻时有激情。一个人在死亡面前不再觉得可怕时，那就是老了。

我走到铁皮档案柜前，用电咖啡壶煮上咖啡。墙上的钟指着十点



差一刻。

我问秘书：“有什么消息没有？”

“一位叫安东尼的先生请你回电话，有急事找你。”她说。

我随手把她告诉我的电话号码在桌上的便条上记下来。咖啡已经在电壶里汩汩地响。我倒了一杯，然后给安东尼先生打电话。

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喂？”

“我找安东尼先生。”

“请问你是谁？”

我把姓名告诉给她。

停顿了一会儿，才回答一声“哦”，接着又是一阵停顿，然后说：“请稍等。”

我啜着咖啡等候着。

电话那头有个男人自我介绍说是安东尼。他说：“你能来一下吗？”

“可以，”我回答，“你要做什么？”

“我不想在电话中讨论，你能出来一下吗？”

“是的，”我说，“我想可以。你的地址？”

他说了地址，那是海岬区。

海岬区与金钱具有同样意义。我猜想不是太太跑了就是女儿私奔。倘若是太太的话，她肯定是想捕捉逝去的青春，在某个海滨和小白脸厮混；如果是女儿，她肯定是和一位留胡子的画家在某个山谷同居。那是古老而悲哀的故事，你以为他们生活得幸福美满，但事实却不然。

我不想去琢磨陈尸金门公园那个名叫布伦达的女子，她头部中弹，我的名片在她的皮包里。

我告诉秘书，我要出去一会儿。然后，披上大衣走下楼。

海岬区高高矗立在一个绝壁上，俯瞰着旧金山海湾的入口，那儿很幽静。在旧金山市你可以用一个人房子的大小和坐落的位置来估量他成功与否。

看来安东尼是一个有所成就的人。我把车停在街上，看着那座房



屋，心里觉得不舒服。

我坐在那儿抽了一会儿烟，接着下车沿铺砖的小路到大门。房屋后面，我能看见白色的太平洋。

一个瘦瘦的年轻女子为我打开门，她大约二十岁，神色非常紧张，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松鼠。

我报出姓名，然后说：“安东尼先生和我有约。”

“是的，”她说，“请进。”

过道非常暗。女孩走在前面，我被领着穿过一个拱门进入起居室。地面铺着瓷砖，我的鞋跟落地发出很大的声音，使我不安。

女孩子在一个巨大的沙发前停步，她说：“我去告诉父亲，请稍等。”

“谢谢。”

在那儿坐了大约五分钟，从过道的拱形门那儿走出来一位穿西装的男人，他以一种英国式的步态向我走来，并且伸出一只修剪整齐的手。

我站起来，握住那只手，他的手很有力。

“你好，”他说，“我是安东尼。”

“你好。”我说，同时有点儿自惭形秽。

他大约四十五岁，很英俊，有一张相当英俊的脸，满头银发，灰色眼睛露出稳健的神色。

“请坐，”安东尼说，于是我又坐下，“想喝一杯吗？”

我谢绝了，上午喝酒会使我消沉。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要喝一杯。”

我没有说话。那是他的家。

他走到拱门旁的小托盘那儿，倒了一杯琥珀色的饮料，像码头卸货工人一样一口喝光。

他小心地放下杯子，那位为我开门的瘦长女子，正站在拱门那儿。安东尼用灰色眼睛看着她，问道：“埃达，你有事吗？”

她摇摇头，迅速转身离开了。

安东尼走到沙发前，在我对面坐下说：“我女儿，她喜欢幻想，

将来很想成为作家。”

我说：“安东尼先生，你在电话中提到关于寻人的事……”

“是的，”他说，“我儿子约翰失踪已有两天了，我非常担心。”

我想到自己没有猜对，禁不住有点儿尴尬，清清喉咙说：“你和警方接触过没有？”

“没有，”他说，“我没有报警的理由。”

不错，我了解。住海岬区的人往往尽可能地避开警方，生怕一点儿小事会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除非事情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我说：“你儿子在哪儿，你有没有发现一点儿线索？”

“根本没有。他在大学念法律系，星期一他离家上学就没有回来，但同学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去哪儿啦。”

“也许他出去玩了，”我说，“搭便车就走，年轻人有时候就是那样。”

“约翰是个正直谨慎的年轻人，”安东尼说，“他要是旅行的话，事先一定会告诉我。你身后就是他的照片。”安东尼说着，做了一个戏剧化的手势指给我看。

照片上的人一头金发，眼睛碧蓝，五官端正，那模样就是你想象中生长在海岬区的孩子的典型。

安东尼说：“他和女儿都是我现在仅有的亲人，夫人三年前去逝，父兼母职，确实难当，尤其是对两个正在成长的孩子。”

“安东尼先生，”我说，“我乐于为您效劳，但我不知道从哪儿查起。”

他灰色的眼睛打量着我。

“你已经向他的朋友打听过了。”我说，“我怕我也只能那样做。我可以到学校找教师们谈谈，四处打听，可那似乎没有意义。很可能等我打听出什么眉目时，他已经回家。我相信他离家两天不会出事的。”

安东尼冷冷地说：“你的意思是不肯帮我忙？”

“不，没那意思，我只是和你实话实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愿意试试。”



“那么，你意思是说，我等候一阵再采取行动？”

“我没有任何意思，安东尼先生，我只是提出一个想法。要是你真觉得你的儿子惹了什么麻烦或有什么意外，当然要采取必要行动找到他的下落。”安东尼忽然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我们站着互相看着对方，我仍猜不透他眼中的神色。

过了一会儿，他说：“假如他没有回家，或者再过一阵没有他消息的话，我可以再麻烦你吗？”

“当然。”

安东尼从上衣口袋掏出皮夹，抽出几张钞票递给我说：“谢谢你的帮忙，谢谢。”

“安东尼先生，没有这个必要。”

他不理会我的话，把钞票塞给我，而后送我到门口。

坐在汽车里，我看看钞票：五十元。我为此可能得跑五趟，也许不止。但那不会有什么进展的，我告诉安东尼的全是实情。

下午两点三十分，维克多来我办公室。

他喝着咖啡说：“那个叫布伦达的有新发展，中午从验尸室传来了消息。”

我等候着。

“她已经有了身孕，”维克多说，“三个月。”

我倒抽一口气，说：“这些女孩真不可思议！对我的名片在她皮包里的事，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有的。”维克多说，“似乎布伦达最近收到一些匿名信，她对那些信十分不安，计划找一位私人侦探。”

“我？”

维克多说：“是的。但不知怎么，她从没有找你。”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们做了一些调查，”维克多说，“她和一个叫玛德琳的女孩在一起住，她们都是伯克来大学的学生。”

“你认为那些信和布伦达的死有关？”

“也许。”维克多说，“但是，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也与男友有